



抗战文学与革命文艺运动的新路向

□杨洪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奋力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抗战时期。民族的命运深刻地影响了文艺的命运。抗战文学的应运而生,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回顾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抗战文学的影响,我们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正是党的红色基因的注入,才有了抗战文学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

引领民族抗战文学的方向与道路

抗战文学的兴起,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同年11月,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就明确提出“左联”内部先后提出了“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周扬)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显然,正是面对新的历史阶段,两个口号的倡导者一致认识到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学运动、新的指导思想,联合更多的作家,创作更多的反映民族革命的文学作品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迅疾变化的民族抗战的大形势下,究竟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和概括新阶段的文学创作的具体理论,“左联”团体内的作家存在着分歧,并由此一度发生了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1936年,党员作家冯雪峰由陕北来到上海,与鲁迅进行交流。8月初,鲁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明确表示拥护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他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鲁迅的观点引导了两个口号的并存,消减了论争中双方派别的激烈情绪,推进了文学界的联合。很快,全国文艺界不仅成立了100余人参加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且先后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至此,文艺界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局面逐渐形成。

伴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山河破碎,抗战的硝烟将千万人民带进了饥饿和死亡的灾难中,抗战的烈火也锻炼了人民,使得他们坚强、勇敢,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前线。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宣告成立,选出郭沫若、茅盾、丁玲、夏衍、胡风、田汉、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作为名誉理事,对“文协”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指导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文协”是党所领导的一次最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文协”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作家们深入战火硝烟之中进行书写。源于战地需要的创作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大多采用贴近军民生活、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抗战文学中大量的诗歌(包括鼓动诗、朗诵诗、长篇叙事诗)、报告通讯、速写、戏剧(包括歌剧、独幕话剧、街头剧)

(上接第1版)

王毅:中华诗词给您带来了什么?又能给人们带去什么?

叶嘉莹:古典诗词一向是我所挚爱的,也正是古诗词的无穷力量,帮助我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命运坎坷。

很多人也曾这样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钟蝶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咏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你的眼前……

我曾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诗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我曾在南开大学举办多次古典诗词的讲座。讲诗词的时候,我曾台下莘莘学子,曾给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什么是诗?诗是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的一种关怀,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15岁时,我曾写了一首诗《秋蝶》。“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今天来看这首诗,那个时候我无意识中在诗词里就有对人生问题的思索。

自从开蒙时接触诗词,此后的90多年人生里,不论是我年轻时经历丧母之痛、辗转台湾经历白色恐怖,还是我中年时不幸丧女,在遇到苦难时,为了排解苦难,我都会用诗词来表达,用诗词来排解忧愁。中国古典诗词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

等文学样式特别繁荣,还有鼓词、快板书等民间曲艺也深受欢迎。这些新型文艺创作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

这场人民群众最广泛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抗战文学的重要影响是使文艺与民众进一步紧密结合。它激发作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关系的思考。1940年至1942年,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和文艺整风运动。这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论著,直接影响了抗战文学新理论的建构,尤其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完整而系统地制定了一条党的革命文艺的路线,明确文艺的发展方向,深刻阐述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等的辩证关系。这为行进中的抗战文学指明了正确的思想方向,乃至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笔部队”与抗战文学肩负的使命

在抗战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支特殊的部队——“笔部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文协”及时向作家发出了号召:“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为此,抗战文学中一支支“笔部队”应运而生。

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率先酝酿成立了以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其主旨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西战团”的第一阶段,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1938年5月,又一支“笔部队”——“抗战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组建完成,先后分派多个小组,每组3至5人深入战区工作。参与的作家有刘白羽、吴伯箫、卞之琳、雷加、周而复等。同时,以“工作团”为主干,出版了《文艺突击》小型刊物,刘白羽任主编,创刊号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刊名。“工作团”团长刘白羽说:“我们抗战文艺工作团就是为了团结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而组织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地推动文艺组织文艺团体之建立,注意到文艺干部的培养和提倡”,更重要的是进行“文艺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1939年3月,在延安的“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近一年之久。类似的还有延安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迅实验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民众文艺团体组织。11月,“西战团”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由“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带队奔赴晋察冀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作家的活动也颇为壮观。“文协”成立后在武汉三镇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以下简称“慰劳团”),分南北两路到抗战前线的各战区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39年7月,“慰劳团”的“笔部队”集结启程。其中,老舍、胡风等作家向北路进发,在大西北地区行走了5个月,两万多里。为适应战时文化服务和宣传鼓动的需要,1939年6月,“文协”又筹建了“作家战地访问团”(以下简称“访问团”),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团员有葛一虹、杨骚、杨朔、白朗、罗烽、李辉英等13人。“访问团”从重庆出发,长途跋涉,途经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等省,历时半载,深入重点战区访问了中条山、太行山两大战区。“访问团”所到之处,“给予了前方军民以异常的兴奋与鼓励”,“使得战地的文化工作更有了辉煌的发展”。这应该是抗战文学中“笔部队”影响最大的团体组织了。另外,作家姚雪垠后来回忆:“在39年春天,为响应总会‘到战地去’这个号召,我同克家、孙陵,另外两三个青年同志,从襄樊到随枣前线。”他们深入偏僻的皖北第五战区,自称为“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文协鄂北分会”,开辟了抗战文艺一片新天地。

一种力量。

王毅:这次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迎三八妇女节,庆祝党百年”全国女子诗词大会的启动仪式,也看到了您为大会专门录制的视频,特别感动。您是中华诗词学会女子诗词工作委员会的首任主任,这次换届,您担任荣誉主任。您怎么看待女子诗词的历史地位?

叶嘉莹:在中国3000多年的诗词历史上,女诗人从来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次中华女子诗词大会的启动,又给广大女诗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提供了一所培训锻炼的学校,同样也会引领更多知识女性热爱诗词、创作诗词。

在中国诗词史上,女性诗词创作是伴随着男性诗词创作的发展而演进的。它受到传统文化、个体才性、文体观念和女性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女子诗词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

当男性的像《花间集》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时候,男性的词作对于男性的诗歌传统是一种背离。男性的作者多多少少,他所牵涉到的是“仕”与“隐”的问题,可是女子没有这样的资格,女子不能够想到我要修身齐家,是没有资格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志意的。所以在言志的诗篇里边,女子一直处在不利的地位,没有资格跟那些言志的男子争一日之短长。

有了“词”这种文体后,就有了女性的形象、女性的语言,女性可以写自己的伤春怨别。诗,女子虽然也作,可是始终作不过男子,因为似乎男子都有志可言,女子无志可言。

以李清照为例,在时代的演进中,李清照是个很幸运的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有很好的才学,所以她小的时候受到很好

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除了上述团体外,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文艺作家团体,他们积极深入前线和后方进行抗日宣传。

正是这些蔚为壮观的、活动着的“笔部队”,使得抗战文学有了鲜活流动的精神气脉。前线士兵需要文艺生活,需要通俗的文艺读物。战地作家群体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战,鼓动斗争,服务战时文化工作的需要。这与其说是文学直接深入了军队和乡村,倒不如说是文学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但是他们不单纯是抗战的宣传队。“笔部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群体,每个作家在此获得了精神的新生。抗战的旗帜,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现代作家有了统一的精神向度,到前线去,浴血奋战的将士的需要就是他们前行的目标。抗战中“笔部队”肩负着抗战文艺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刘白羽在谈到为什么组织“工作团”时说:是抗战的前线需要作家,“因为在那里,是时代中表现得最紧张,休戚相关的,充满了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事实,群众怒潮般的动员,敌之残暴……”“访问团”出征前也有这样的集体告白:“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诗歌的形式、小说的形式,用戏剧、散文、图画种种形式去写,我们的枪已经能够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笔部队”作为战时一种特殊的作家组织,正是因为自觉地把握了抗战时代的脉搏,将个人的生与死置之度外,他们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定格了抗战文学雄浑而壮丽美的基调,也书写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史册新的篇章。

抗战文学的成功经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我们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此,“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既是对民族抗战文学肩负历史使命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文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抗战文学的历史特征的概括。这最集中地体现了时代共识和要求。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正是战争中文艺的大众化,文学及时感应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最大限度地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家国情怀发挥到了极致,与时代社会同频共振,才能成就文学的灿烂辉煌。这正是抗战文学创作带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文艺面向大众,这是抗战文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我们党引领现代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理念。“文协”正是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将作家推向民间、前线,使得文学源于民间、前线,又回到民间、前线。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了一个崭新的抗战文学再造。这中间大众、民间、前线的实体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联系大众、民间、前线?是通俗化、旧形式吗?这些问题在文艺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讲话》中“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之问和其深刻的阐释,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方向。作家真正贴近了抗战时代的现实生活,文学与民众完全融在一起,身份的确定、形式的认同赋予了抗战文学特殊的功能,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天地,也拓宽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领域。作家艺术家的深入战区,“面向大众”的共同话语,为新文学大众化路径探索了宝贵的经验,这对后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文学也提供了积极的启示。(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些论述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别的文艺观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尤其强调人民性。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提出了文化艺术的“人民性”的概念,举起了维护作品人民性的旗帜。如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有针对性地说:“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1870年,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中,表达了对16世纪以来备受迫害的爱尔兰弹唱诗人的极大同情,肯定了弹唱者的残留作品为“最优秀的遗产”,评论“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文艺作品的人民性。

至于“人民”的概念范围,列宁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种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应该创作出反映最广泛人民群众心声的文艺作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家艺术家就要有人民立场,在创作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我们一定要牢记创作的使命,从立场、观念上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端正文艺创作的方向。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批判“不把含有历史意义的合理内容作为当代意识来反映的艺术”,进而批评一些人不要只把自己的创作“局限于‘小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的及思想界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

在今天,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原则面前,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创作:我们的创作是不是与人民、与历史、与时代背道而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面向人民,从感情上热爱人民,从行动上表现人民如何创造历史、创造新生活,就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陕西作家柳青、河北作家贾大山等,都为我们树立了热爱人民、深入生活的好榜样。当下的文艺新阶层层出不穷,他们普遍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创作丰富,也创作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但总体而言,需要更多的青年作家克服浮躁心理,肯于像老一代作家艺术家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实践中,始终活跃着青年人的身影,而我们的青年作家艺术家也要在文艺世界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新一代作家艺术家们敢于走出自己的小安乐窝,离开高贵的象牙塔,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素材。现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与文艺创作者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广度深度紧密相连。列宁曾经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它们得到发展。”对于它下的写作者来说,就是要群众责任和使命,真切反映现实的巨变和人民的心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感恩人民群众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创作的原材料。他们是历史的演出者和编剧,也是任何作品的评判者。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俄国阿·托尔斯泰也明确地说道:“艺术首先是人民的。因此,艺术的创造者和品评者是人民,也是我们大家。”“人民,就是艺术的法官。”别林斯基则说:“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毛泽东论及作品要通过社会效果来检验。周恩来也说,戏剧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领导回答”。人民,就是评判艺术的绝对权威。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针对文艺发展的大势和文艺界的一些痼疾而提出的。他高瞻远瞩地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这些都给我国文艺事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品。让我们用创作实践来证明吧,这是一条艰辛而光明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军人诗词爱好者有什么希望和期待?

叶嘉莹: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对部队官兵而言,多少年来,一代代军旅诗人以浓厚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创作了无数激荡人心的诗篇,如:“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它们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励战士们驰骋沙场、舍身报国,展示中华儿女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

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名诗人,我认为诗词能让人心灵不死。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身体允许我还可以讲,我愿意一直讲下去。所以我我要把自己亲身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来,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如果我不能传给下一代,在下对不起年轻人,在上对不起我的师长和那些伟大的诗人。

我一生,有70多年从事教学,我觉得这真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作,愿意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感悟诗词之美。如果有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王毅:是啊,中华诗词之美,道阻且长,但只要溯源从之,终能接天映日,十里飘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袁学骏